

民國秘史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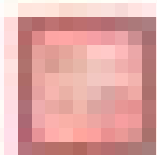
貳

《民国秘史》编委会。主编



民國秘史

民國秘史



民國秘史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民国秘史》编委会。主编

貳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秘史. 第1卷 / 《民国秘史》编委会主编.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80094-072-9

I. ①民… II. ①民… III. ①中国-近代史-民国
IV. ①K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6252号

民国秘史

编 著: 《民国秘史》编委会主编

责任编辑: 冰 宏

总 策 划: 三读藏书馆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500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295.00元

官场秘典

黄兴预作中华民国国歌被发现

中华民国成立后，颁行了由孙中山所作的国歌，后国歌曾几经更易。而黄兴在民国成立前筹备军事起义时所预作的中华民国国歌，因未曾公诸于世，却鲜为人知。现据所掌握材料，略作介绍。

黄兴于长江两岸做好军事部署后，由上海起航下南洋。此行是接受孙文邀请，同行者有宋教仁、冯自由、林觉民、熊克武等10余人。

坐的船是日本昭和丸海轮，经过港口有福州、汕头、香港、菲律宾、西贡。因旅客上下，货运起卸，均得靠岸停留，行程缓慢。黄兴处于天地悠悠、大海茫茫中，一时灵感触动，撰写了《中华民国国歌》。

查我国之有国歌，始于清末，先后公诸于世者有数次之多，特抄录如下：

1911年清廷制订国歌，词曰：“巩金瓯，承天幬，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皋，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1912年有沈思孚国歌撰稿，词曰：“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族荣光，锦绣山河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1915年袁世凯称洪宪帝制，亦制国歌，词曰：“中华雄踞天地间，廓大埏，华胄以来昆仑颠，江湖浩荡山绵连，勋华揖让开尧天，亿万年。”

1918年徐世昌为民国总统，尊依“卿云歌”为国歌！词曰：“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1943年国民政府公布国歌，词曰：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始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话说黄兴当年撰写国歌，只因国旗问题与孙中山发生分歧，这首国歌没有公诸于世，亦没有提交同盟会讨论，以致胎死腹中。当时颁行的中华民国国歌，是孙中山所作，原先是黄埔军校校训，北伐成功后，定都南京时，由国民党中央议决遵行。

兹抄录黄兴所撰国歌如下：

巍巍中华，风云浩荡。
地大物博，长发其祥。
四万万五千万生民共同王业，
亿万世统绪，永垂无疆。
西望喜马、昆仑，蜿蜒壮丽，
东临太平洋，辽阔苍茫，
五岳高万仞，长城万里长。
九万里河山锦绣，五千年文化

辉煌。

中华！中华！源远流长。
圣德道统，尧、舜、禹、汤。
为人类文明启钥，为世界和平
导航。

飘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
以民主、共和建国，奋发光芒。
中华！中华！国泰民康，
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
中华！中华！国泰民康，
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

广州黄花岗起义前，黄兴居无定所，



随身携带文件，交由湖南桂阳革命元老李国柱带返湖南保管，民国建立，黄兴风尘仆仆，会晤很难，无法物还原主。直至黄

兴逝世多年后，才由李国柱提供，公布于世。

(王德成)



黄兴“登台拜将”与黎元洪的阴谋

黄兴“登台拜将”，是在辛亥武昌起义中，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效法汉高祖刘邦，设台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于11月3日，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关于设台拜黄兴为将的事，过去有关史书中，一般都认为，是湖北革命党人公推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为“郑重其事”，采取“登台拜将”的仪典，报请黎元洪许可而举行的。这种说法，见诸于居正《梅川日记》和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等书。

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是用来尊崇韩信，并以此来提高韩信的威望而压服三军所玩弄的权谋。事后韩信不仅以此为荣，并以此深得刘邦和三军的信任。黄兴未到武昌前，革命军总司令一职，本由黎元洪兼任。自比汉高祖刘邦的黎元洪，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是否也要尊崇黄兴，并以此来提高黄兴的威信呢？黎元洪自比刘邦，已属可笑；黄兴在革命军民中的威望，远比黎高，由黎拜黄为将，更属不伦不类。

黄兴是同盟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在辛亥革命时期，凡属著名的革命之役，多数都由他参加，是一个革命的实行家，在革命党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辛亥武昌起义之前，湖北革命党的领导干部，曾派人去香港邀请他（还在上海邀请宋教仁和谭人凤）速来武汉主持领导，发动武装起义。但因黄花岗之役的失败，使他灰心丧气，他又对湖北的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认识不足，因而没有应邀及时来汉。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黄兴得知武昌起义的胜利消息后，于10月24日赶上上海，28日到达武昌。

此时，由于清军大举南下，汉口战事十分吃紧，大局岌岌可危。特别是前线指

挥无人，前有总指挥何锡藩受伤辞职，后有总指挥张景良通敌正法，正是群龙无首。黄兴的到来，武汉革命军民都把他比作“天将下凡”，把收复汉口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莫不翘首仰望。

黄兴到达武昌，也给黎元洪及其同伙打了一剂强心针。因此黄兴南渡武昌时，黎元洪派出代表带着军乐队、仪仗队在江岸迎接，仪礼颇为隆重。

黎元洪及其同伙在一时兴奋的同时，也感到内心的苦闷，担心威望卓著的黄兴，会有碍于黎元洪的都督地位。黄兴在从上海赶赴武汉的途中，曾在轮中对同行者田桐等人说：“黎元洪本非革命党人，我到鄂后，必须取而代之，且称两湖大都督。”11月2日，革命党人集议，田桐等人提议公推黄兴为湖北湖南大都督，位于黎元洪之上。但这个提议遭到湖北地区观念较重的首义人士刘公、孙武、吴兆麟等人的反对，主张由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宋教仁只得表示说：“此事不过征求大家同意，我们原无成见……既有利害冲突，即作罢论可也。”最后大家复议定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所有湖北革命军及各省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

黎元洪得知有人拟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更感到对他的地位是个威胁，他决不愿意受黄兴的节制，也不会让黄兴插足于湖北军政府之中。因此，必须除之而后快。但黄兴刚被迎来不久，又如何“驱黄”呢？于是黎元洪及其亲信孙发绪等人，在既兴奋又苦闷的情况下，便策划了一场“驱黄”的阴谋，所谓“登台拜将”，就是这一阴谋的产物。解放前出版的《新生月刊》第5卷第2期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对



此事有一段记载，现摘录如下：

正在这种沉默的空气中，孙发绪起而言曰：“此事不难，驱黄出省可也。”黎等讶曰：“今日才迎，怎好便驱？纵驱之，其如黄不去何？”孙发绪道：“可用阳尊阴逐之策，请都督（指黎黄陂）仿汉高祖登台拜韩信的故事，于明日（按：11月3日）就都督府前坪（阅马厂）高搭将台，预备“战时总司令”印信一方，令箭一枝，总司令大旗一面，届时集合全军将士，由都督亲捧印、箭、旗三物，拜受于黄为战时总司令，请其率师北伐，并于汉阳设置战时总司令部，迨登台拜礼毕，即送黄渡江就职。这么一来，黄兴即被逐出于省垣了。尔后战事若利，则黄率师北上，自然离鄂日远。战事不利，则军法所在，纵不便持法相绳，黄亦无面见江东了。”黎等闻谋称善，于是星夜如谋筹备。

11月3日，在武昌阅马厂设立了一座将台，举行了规模隆重的仪式。黎元洪传知各机关人员及军队营以上的官佐集合于台前，并派军队一标于正午齐集军政府，在将台四角树立军旗，中立一“战时总司令黄”六字大旗。当军队军乐队毕至，文武咸集时，首先由黎元洪登台宣告：“本都督代表中华民国四万万同胞及全国军界同胞，特拜黄君兴为战时总司令，于本日此时就职……我将士皆须诚心悦服，听其指挥。”说完，请黄兴登台就职，接受关防、聘状、令箭。黄兴接受后，也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今日既承黎都督与诸同志举兄弟为战时总司令，为国尽瘁，亦属义不容辞……尚望大众努力前途为要。”黄讲完，上台台下欢声雷动，气氛极其热烈。当晚，黄兴戎装出发汉阳，在汉阳昭忠祠设司令部，于归元寺设粮台，准备保卫汉

阳，反攻汉口。

尽管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但当时的整个形势对黄兴还是有利的。他身负重望，得到全体革命军民强有力的支持，其他省也在陆续响应，如果黄兴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政治上团结一切革命党人和其他同情者，孤立和分化封建势力，有步骤地解决湖北革命的领导权，使之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不是不可能的。但他没有这样做，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取代黎元洪，而是把重望当作了压力，压力又往往求胜心切，产生急躁情绪。他一到武昌，便不顾一切，立即全力以赴地扑向军事。从10月28日至11月26日，他几乎都在汉阳夜以继日地组织军事和指挥战斗。结果由于敌强己弱，革命党人内部又不团结，相互之间不能协同作战，战事失利，这给黎元洪以可乘之机。在汉阳危急，黄兴几乎丧生的情况之下，黎元洪却依然稳坐武昌，“以其威名出己上，不甚与协”。

26日汉阳失守，黄兴以十分悲痛的心情退回武昌。27日，在武昌军事会议上，黄兴由原来的求胜心切转变为悲观失望，痛不欲生，提出放弃武昌而攻取南京的错误主张。这样全部矛盾都集中在黄兴身上，引起许多人的强烈反对，甚至张振武当众出示手枪，说再以放弃武昌为言者，即属汉奸，当场可击杀之。黄兴心情沉痛，有口难辩，在此窘境中，抱愤辞去总司令一职，于当晚离汉返沪。

黄兴全力以赴地扑向军事，完全是出于对清政府的仇恨和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表现了他身先士卒、英勇无畏的革命献身精神。他在汉阳的失败及其辞职返沪，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是由黎元洪及其亲信孙发绪等人所设置的“登台拜将”的阴谋而摆布的。不过，黄兴在汉阳的失败及其辞职返沪，又使黎元洪及其亲信孙发

绪等人的“拜将”阴谋得逞，黎元洪的都督依然大权在握。

玩弄阳尊阴逐的阴谋诡计，是黎元洪及其同伙政治上虚弱的表现。黄兴在汉阳的失败，为许多人所谅解。他在整个阳夏

战争中的巨大功绩，将永远写在中国近代史册上，为后人所称赞；黎元洪及其同伙连同他们的“驱黄”阴谋，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后人所唾骂。

（石芳勤）





黄兴与袁世凯的关系三部曲

宋教仁被刺前与袁世凯的关系

在这一年多时间内（1912年1月到1913年3月），黄兴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一度认识不足，但并没有妥协退让。

关于议和。一些作者首先抓住这个问题非难黄兴，认为武昌起义后，民军应乘势北进，一直打到北京，迅速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不能与以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的清政府议和，黄兴力主和议，所以他是完全错误的。这是脱离具体形势而发的空论。因为当时黎元洪之流的被迫革命派早已不愿与清军作战了；而另外一些投机的革命分子，也不愿将革命进行到底。所以，“孙大总统已允与清廷议和，南京派伍廷芳，北京派唐绍仪，在上海已开议，此间不便再持异议”。对此，黄兴曾对耿毅等人讲：“本意扫清清廷庸劣政治和旧军阀官僚分子，初起时，各省军队和一般人士，均甚奋勇激烈。及闻议和，吾辈同仁尚有直捣黄龙之心。而附和革命者，不是盘踞地方，就是拥兵自卫，只求目前名利，不计将来祸患，甚至以军队名义要求非和不可，并暗与袁通气。加以黎宋卿（元洪）本非革命者，更坚主和议，我若过于强制，他即单独与袁议和。大势如此，我何能独持异议。孙大总统初回国，尚不知此中内容，责我过于软弱，我只好忍受。”

关于“南北一家”，1912年秋，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入京会谈国事。据后来黄兴的儿子黄一欧谈，黄兴“本来是不准备去的，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以后，来电极力敦促，先君才于9月11日入京……当

时京中人士到处开会欢迎，先君莅会演说，宣传三民主义。有一次，湖北旅京同乡在湖北会馆开欢迎会，先君演说之后，会馆负责人请他题字。先君不假思索，立即写了‘南北一家’四个大字。斯时斯地，题这四个字，是十分发人深省的”。黄兴在当时当地题那四个大字——“南北一家”，并不是“说明他已经把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看成一家人了”，而是说明辛亥革命已把清政府推翻了，革命已把全国统一了，北方和南方人民要团结起来，像一家人一样。孙中山在其“通告解职令文”中也有同样提法：“赖国人之力，南北一家，共和确定”。孙中山这样提可以，黄兴这样提为何就成了“罪状”了呢？

有人说，不只这四个字的题词，还有他2月24日给袁世凯的电报，把袁世凯吹得天花乱坠。如说什么：“现时南北统一，共和成立，建设方殷，公素著伟抱，此间（指南京）军民企盼甚切”；“今南北一家，总统得人，民国从此万年……吾辈十余年，兢兢业业以求者，真正之和平，圆满之幸福，今目的已达”等等。我们认为这份电报中的话，有的是外交辞令，有的是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要具体分析，不能据此说黄兴对袁世凯是妥协退让。因为这既是阶级的限制，也是时代的限制，我们不能苛求于他。当时孙中山对袁世凯也有这种看法和说法。如他在2月14日给袁世凯的电报中就有这样的话：“文以菲才……日夜希冀推贤让能，苟得如公者，举而自代，其缔造国民幸福，当非意料所能预测……清帝逊位，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这只能说明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

谁能据此说孙中山对袁世凯妥协退让呢？

事实是：在此期间内，黄兴对袁世凯不但未妥协退让，而且作了一定的斗争。如1912年2月底，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为了向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曾指使其走卒在北京制造了一次乱兵暴动，并以此作借口，想扩大反革命军队新哨三十营，黄兴曾坚决反对，这在他1912年3月11日给袁世凯的电报中就可得到证明。又如1912年4月，他在检阅耿毅所部革命军后训话时说：“民族革命系吾辈责任，现在虽成立共和政府，仍要加意保护，有破坏者，当以铁血拥护……”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年8月13日，当黎元洪勾结袁世凯将湖北军政府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将校团团长方维以莫须有的罪名惨杀于北京后，革命派无比愤慨，黄兴则带头对此公开揭露和抗议。

又，1912年9月7日，袁世凯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曾授黄兴为陆军上将；“双十节”（10月10日）时，对他授勋不久，又派专使到上海黄兴寓所，送来陆军上将特任状、授勋令和勋章，另外还有几件礼物与两匹英国种良马。黄兴勉强收下后，对其子黄一欧说：“你知道吗，这是袁世凯的笼络手段，可是我不会上当的。”他随即将特任状、授勋令、勋章以及所有礼物都退了回去，只留下那两匹马。其子问其故，他说：“因为将来还要我打仗的。”（黄一欧文）和谁打仗呢？当然是指和袁世凯这样的窃国大盗打仗了！当时上海同志问他对袁的看法，他慨然道：“袁阴险狠毒，他日必叛民国。万不料十多年来，我同胞志士，抛掷无数头颅，无数颈血，只换了一个假共和，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多事，再经两三次革命，还不得了呢！”可见他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已经有所认识了！

“二次革命”前后他与袁世凯的关系

在这一年多时间内（1913年3月到1914年3月），他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能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关于宋教仁被刺。宋教仁是同盟会的十干事之一。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后，他便成了国民党的实际负责人。他利用农林总长的合法身份在各地公开进行政治活动，极力宣传责任内阁制，企图利用国民党议员的多数表决，达到组织国民党责任内阁、自己担任内阁总理的目的。袁世凯对此是绝对不允许的。因此，1913年3月20日便派人将他刺于上海火车站（22日死于医院）。他对袁的罪行立即揭发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他原主张对袁要“以其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曾与孙中山“分电湘粤两都督，要求其同意。当得其复电，皆反复陈其不可”时，他才认为国民党所控制的军队正在整理训练中，不能作战，应候法律的制裁。这显然不能说明黄兴对袁世凯妥协退让。因为当时的形势的确如此：“总理即电令广东独立，广东（胡汉民）不听；欲亲赴粤主持其事，又为党员所尼……命陈其美独立于上海，陈等以上海地小，难与（袁世凯）抗……总理又促南京独立，而党员以下级军官未能一致为辞。”但当袁世凯不经参议院同意，非法借外债2500万镑，又于6月免去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孙中山坚决命令革命党人讨伐时，黄兴动员了一切力量迫使江苏都督程德全于7月15日宣布独立。他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后，





与袁世凯所派的北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关于讨袁的斗争。袁世凯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除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外，对革命党人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黄兴宣布独立后，已被袁世凯收买的讲武堂副长傅鉴、要塞掩护第二团教官程凤章等表示反对，黄兴马上下令枪毙，以清内奸。同时命令第一、第八两师，分兵由津浦铁路专车至徐州，会同徐州驻军第二师师长冷遁抵御北兵南下。在孙中山的号召组织下，在黄兴的带头影响下，先是李烈钧于7月12日兴师于江西湖口，继南京15日独立后，17日柏文蔚独立于安徽，18日陈炯明独立于广东，20日许崇智、孙道仁独立于福建，13日陈其美攻上海制造局以响应。在讨袁的第“二次革命”即将失败前夕，黄兴在南京的处境非常危急，大家劝他立即离开南京时，他仍坚定地说：“即使兵剩一营，亦愿与敌死战。”表示与袁世凯作战到底的决心。后经大家多次劝促，他才在安排了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第八旅旅长王允恭在南京维持局面后，离开南京去上海，然后转往日本。

黄兴逝世前对袁世凯的态度

在这两年多时间内（1914年3月—1916年10月），他虽然远在国外，但并未放松与袁世凯作斗争。

黄兴于1914年3月往游美洲，在美国旧金山受到中外人士万余人的欢迎。他在欢迎会上讲到袁世凯时说：“袁世凯以武力统一全国，必归失败。盖操胜算之权，不

在兵精，而恃公理。”以鼓励革命者与袁世凯做斗争的胜利信心。

1915年秋冬间，袁世凯称帝的阴谋已经昭著，蔡锷自北京潜至日本，想与黄兴共同策划西南各省举兵讨袁。但当时黄已有病休养，蔡只好独自去云南活动。这时，张继、李根源等，欲向外国富商借款200万元，以供西南起义用。这些富商敬仰黄兴，声明必须由他签名才行。张继电告黄兴，黄欣然同意，与孙中山电商，即让张孝准为自己的代表签名，又电促李烈钧、周震鳞、柏文蔚等，在南洋筹款，以资接济。在此之前，黄兴曾派张孝准代表自己向日本有关方面借款购械，准备回国训练五师精锐军队，作为倒袁的武力。1916年春，云南反袁的护国军起义，紧接着西南各省起而响应，黄兴“潜筹默运之力居多”。当刘揆一在天津创办《公民日报》、鼓吹反对帝制时，黄兴命令他要联合居正、耿毅、刘基炎、吴大洲等，筹划直鲁革命，以响应南方。蔡锷于云南起义后，感到自己任重力弱，电促黄兴迅速回国。当时，他虽重病在身，仍毅然于1916年6月3日，自美洲返国，以备直接参加反袁世凯的斗争。

综上所述，可见黄兴于辛亥革命初期，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曾一度认识不足；但后来当他认识清楚后，则是坚决斗争的。怎么能说他“主张对袁世凯妥协投降，成为革命党内部妥协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呢？

（据开长发：《论辛亥革命后的黄兴》，本书引用时，略有删改。）

关于黄兴主张放弃武昌的传闻

汉阳失守以后，黄兴是否提出过放弃武昌的主张？在近30年的中外史学论著中，几乎众口一词，肯定他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有的论著甚至认为：“和历次革命起事后，一到失败，他就脱身而去，如出一辙”，这是黄兴的特点。个别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不论黄兴还是别的革命领导人，当时不可能提出这样的主张，是湖北某些军阀政客“蓄意捏造的”。事实真相究竟如何？笔者拟就最近接触到的一些有关资料，先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意见作些介绍，再谈谈个人的两点粗浅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两种传闻

1911年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退回武昌，与黎元洪等召开会议，讨论形势和对策，旋即乘轮东下，离汉赴沪。汉阳失守以后，或者更确切地说，在27日的会议上，黄兴是否提出放弃武昌进取南京的主张？黎澍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毛注青的《黄兴年谱》、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周锡瑞的《改良与革命》等中外历史著作，都说黄兴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只有《黄兴与中国革命》的作者薛君度，认为黄兴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这样不合乎军事常识的主张。两种意见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各自所根据的资料不同。

前一种意见所依据的主要资料，有胡祖舜的《武昌开国实录》、张知本的《黄克强先生二三事》、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王

树楠的《武汉战纪》、谭人凤的《石叟牌词叙录》、甘绩熙的《阳夏鏖兵实录》、范腾霄的《辛亥首义前后》、王振民的《参加独立将校决死团经过》，以及汉口汉康书局出版的《张振武之革命战史》等；后一种意见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李廉方的《辛亥武昌首义纪》。

针对上述两种意见，石芳勤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发表了《黄兴在汉阳失守后是否提出过放弃武昌的主张》一文，认为“黄兴提出放弃武昌的主张，不仅有其可能性，而且更有其事实根据”。其可能性主要表现在汉阳失守以后，黄兴曾准备“一死以谢同胞”，说明他此时情绪沉痛，思想消极，对敌我力量估计不当，提出放弃武昌的主张符合当时黄兴的思想实际；其主要事实根据，则除上述范腾霄、谭人凤、曹亚伯、张难先、胡祖舜等人的资料以外，还有杨玉如的《辛亥革命先著记》、李春萱的《辛亥首义纪事本末》等。对此，薛君度撰写了《黄兴“放弃武昌”小议》一文，不同意石芳勤等肯定黄兴曾提出放弃武昌主张的说法，认为中外学者“只根据当时参加过武昌军政府会议的人事后记述而支持其意见。但既然参加者事后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怎能‘肯定’的说甲是而乙非”，“事后既有不同说法，谁能‘肯定’不合乎军事常识的说法，较之符合常识的说法，更为可靠”，因此，他主张：“如果不能接受后者，最好的办法，还是‘存疑’。”

上述情况说明，无论在资料或论著方面，持前一种意见的占绝对多数，但疑点也确实存在，问题没有解决。最近，笔者因工作关系，意外地看到1912年黄兴的一





篇演说词，其中特别谈到了关于放弃武昌主张的问题，对于解决这件有争议的重大史实，很有参考价值。

黄兴的一篇演说

1912年9月初，孙中山致电黄兴，告以在北京与袁世凯会谈情况，促黄北上共商国是。6日晨，黄兴乘轮离沪北上，11日抵京，偕陈其美往见袁世凯。晚上，与孙中山出席前清皇族欢迎会。12日，应邀出席旅京善化同乡会的欢迎会，到会者50余人，首由会长刘颂虞致欢迎词，继由黄兴发表演说。28日，上海《申报》以《黄克强自述革命历史》为题，整理发表了这篇演说词。

黄兴的这篇演说词，无论是1914年和1916年美国旧金山大埠华侨团先后编辑出版的《黄克强先生演说词汇编》和《伟人黄兴政见书》，1918年长沙出版的《黄克强先生荣衰录》这些早期印行本，还是1968年和1973年台北出版的《黄克强先生全集》，以及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黄兴集》，均未收录。中外各种有关历史著述，对此亦未提及。这是黄兴的一篇重要遗文。演说词不长，只有约600字，为了便于讨论，特先全文引述如下：

昔在日京将往南洋，同县留学诸君开会欢送，是时，亦刘君为会长。俯仰今昔，感慨系之。兴在长沙与刘霖生、徐佛苏共谋起事，会事失败，死者数人。逃至上海，与杨笃生、杨哲子组织爱国协社，会万福华刺王之春案起，兴及同志多被捕。赖江西巡抚夏时电致工部局，获放，遂至日本，思结合革命团体，适孙中山自美洲（按：应为欧洲）来日京，因日人宫崎寅藏介绍相见，谈论极合，始立同

盟会，用文字鼓吹，一面着手运动军队。陆军学生回国带兵者日多，南军中已伏有势力，兴遂谋起事，镇南关略为试验。后钦廉官民因捐交斗，郭人漳电询，遂往访之，留其营中3月，鼓吹革命，后又别去。前年（按：应为1911年）广州之役，原定正月，于时，长沙则焦达峰，武昌则居正、孙武，上海则陈英士。布置略定，会购械愆期，乃于三月二十九日（4月27日）午后起事，同志千余人分作数部，兴率120人攻督署。事败，同志死者72人，葬于黄花岗。兴及赵声逃至香港，谋再举。去岁，武汉事已破获，名册尽失，乃于八月十九（10月10日）起义，推举黎君为都督。越数日，兴始至汉，与清军鏖战。其时，各省已先后响应，汉阳之失，兴主张严守武昌，另调粤兵，而日本参谋某甲主张弃武昌，世或以此议咎兴，传闻之误也。兴至上海时，两方已有和议，曾具电致汪精卫，略谓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遂有今日共和之局侥幸成功。兴虽著奔走微劳，而战事实多败北。但天下无难事，惟坚忍二字为成功之要诀。

同前述众多的史料和史学著作的意见相反，黄兴在这篇演说词中，明确指出汉阳失守以后，他提出了严守武昌的主张，提出放弃武昌主张的是日本某一参谋。黄兴的这一说法究竟可信不可信呢？我认为是完全可信的。

首先，黄兴发表这一演说时，距离汉阳失守还不到10个月，对于这样一件当时轰动武汉三镇的大事，回忆不会有错，且当时听众50余人，内容又在当时各地的报纸上公开发表，参加11月27日都督府军事会议的人也多还健在，如此重大的问题绝对不会是虚构。

其次，在这篇演说词中，黄兴依次谈

了他筹组长沙起义、上海入狱、逃亡日本、结识孙中山、组织同盟会、参加镇南关起义、赴广西劝说郭人漳反正、到南洋开展活动、指挥黄花岗之役、参与武汉战事以及关于南北议和等十多件大事，经查对，均与史实完全相符，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主张严守武昌之说竟会失实。

第三，在黄兴十余年的革命活动中，尽管也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我们还没有发现他有隐讳错误或诿过于人的表现，如果他确曾提出过“放弃武昌”这样一个遭到众人反对的错误主张，他决不会推给日本参谋。而且就在这次演说中，他还勇敢地承认自己“军事上实多败北”，怎么会对那个实际上没有造成恶果的主张就不敢承认乃至推给别人呢？

第四，武昌起义后曾任湘桂联军督战官，后任湖北军政府秘书的覃振，在《辛亥革命起义的回忆》一文中明确写道：“……不得已，我军放弃汉阳，隔江而守。是晚（1911年11月27日晚），黄兴与黎〔元洪〕即召集会议，报告汉阳失守情形，并力言现在只有隔江固守，等长江下游发动，才可反攻。所以他决定赶到上海，督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等速举，并令粤中湘籍军官郭、李等发动。”覃振的这一记载，与黄兴的说法完全一致。此外，当时担任参谋长的李书城和担任湖北军政府秘书长的李廉方等，他们在回忆汉阳失守后黄兴的思想、行踪时，也没有说黄兴提出过放弃武昌的主张。

由此观之，黄兴在演说词中说“汉阳之失，兴主张严守武昌，另调粤兵，而日本参谋某甲主张弃武昌”，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真相。

谣传不可信

既然汉阳失守后提出放弃武昌主张的

是日本参谋而不是黄兴，那为什么又有这么多的资料说是黄兴呢？其根本原因，正如黄兴所说，是“传闻之误也”。

首先，黄兴当时是仅次于孙中山的全国性著名革命领袖，他的到达武汉，确是“全局中心，皆集于彼一人之身”，人们把他看作是“天将下凡”，对革命党人和军队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可是，随着汉口的失守，黄兴与黎元洪谁主谁次的争论，以及所谓黄兴蓄意把作战重负交给湖北军队而不交给湖南援军的流言的出现，在一部分人中便产生了对黄兴的不满和不信任情绪；反攻汉口的失败和汉阳失守，这种不满和不信任情绪进一步增长、扩大，这是流言得以传播的基础。其次，“放弃武昌”的主张恰恰是出自黄兴总司令部的日本参谋之口，而且这些日本参谋又是黄兴带来的，所以人们也就容易误认为这一主张是黄兴的意见，结果是张冠李戴，传了开去。第三，汉阳失守以后的当天晚上，黄兴就匆匆离开武昌，次日早晨便乘轮东下，离汉赴沪，这一行动，自然又增加了人们对他的怀疑和误解。第四，当时湖北政界军界比较复杂，矛盾很多，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出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有意乘机借此扩大谣传的传播，从而挑起人们对黄兴的恶感，这也是不应排除的。

基于上述情况，“黄兴主张放弃武昌”的谣传，也就很快在武汉三镇传开了。从后来参与写这方面的回忆录的人员分析，当时这一谣传不仅在政界军界传播，也在民间传播；不仅在领导层传播，也在普通士兵中传播；不仅在革命阵营中传播，也在敌人营垒里传播。因此，民国时期的许多回忆录和其他有关资料在记述此事时，也就以讹传讹，错把日本参谋的主张说成是黄兴的主张，原因就在于此。

正因为这些回忆录和有关资料记述此事时，都是靠传闻写成的，所以失实之处





比比皆是，而有些历史著作却又轻易相信，并据此定案，这就势必互相矛盾，甚至不能自圆其说。例如，关于黄兴提出“放弃武昌”主张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11月27日的湖北都督府军事会议上，但关于这次会议的具体时间，却有三种说法：一说是上午（如范腾霄等），一说是中午（如曹亚伯等），一说是晚上（如胡祖舜等）。事实上，27日晚黄兴才从汉阳败退武昌，旋即渡江到汉口，次日早晨便离汉赴沪，有黄兴参加的会议只能是当天晚上召开，这样，一、二两说便纯属虚构，因为这时黄兴还在汉阳前线督战。可是又有另外一本历史著作说，27日下午黄兴就已搭船到上海去了，如果此说属实，则晚上一说亦难成立。又如，《改良与革命》一书，先是根据某些资料，说黄兴在27日中午会议上提出“放弃武昌”的主张，而后来又根

据另外一些资料，说汉阳失守前几天，齐集上海的各省代表会议派特使至汉阳，“鼓励黄兴放弃武昌，去担任拟议中的南京全国政府的军事领导职务”。“放弃武昌”之议竟在黄兴还在致力于保卫汉阳时就提了出来，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再如，有些资料和历史著作，说黎元洪和孙武也同意黄兴“放弃武昌”的主张，可是另外一些资料却说黎元洪和孙武于27日连续致电独立各省请求援鄂，并召开会议讨论武昌防御事宜，决定总司令一职由蒋翊武代理，部署保卫武昌。诸如此类互相矛盾的记载，在那些回忆录和有关资料中到处可见。因此，对于那些靠传闻写成的回忆录及资料，要注意分析和鉴别，特别是对有关“放弃武昌”一事的记述，不能轻易相信。

（据陈珠培：《黄兴主张放弃武昌吗？》，本书引用时，略有删改。）